

從亞洲觀點看高麗青瓷——

以研究史所見的對外關係爲中心

片山まび著、彭盈真譯

北宋汝窯是中國陶瓷的典範，而高麗青瓷是典範最忠實的追隨者之一。其創始與發展，是中韓窯業密切交流的結果；它也廣泛流傳於東亞，顯示濃厚的國際色彩，因此今後研究高麗青瓷，更應該以寬廣的亞洲觀點來展望。

在亞洲，所謂的「中華」文化圈周邊，環繞著不同國家，其中最早成功燒製青瓷的只有朝鮮半島和越南。大韓民國（以下簡稱南韓）以及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北韓）的學者已對朝鮮半島生產的青瓷做了許多研究，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南韓學者的研究發展相當突出，逐漸釐清長年以來的編年、生產與消費關係等問題。中世紀時的亞洲社會，接受各種中國陶瓷的影響，

而所謂的「高麗青瓷」，是把這些影響以獨特的形式加以昇華而成的作品；它們以擁有極高完成度而著稱，被運往中國大陸、日本列島，甚至東南亞地區，具有很強的國際化性格，因此其對外關係便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大體說來，高麗青瓷生產地相當流行研究中國陶瓷的影響，南韓的前忠北大學校教授姜敬淑對前期至中期之高麗青瓷所受到中國陶瓷的影響，做了詳細的研

究回顧，指出其問題點。（註二）另一方面，由於高麗青瓷有很強的國際性格，不只是生產地的研究者，對其他亞洲地區研究者來說，也是回顧本國陶瓷史之外的重大研究課題。因此本文便從一介日本籍的外國研究者的角度，以對外關係爲重點，簡略概觀高麗青瓷之研究成果與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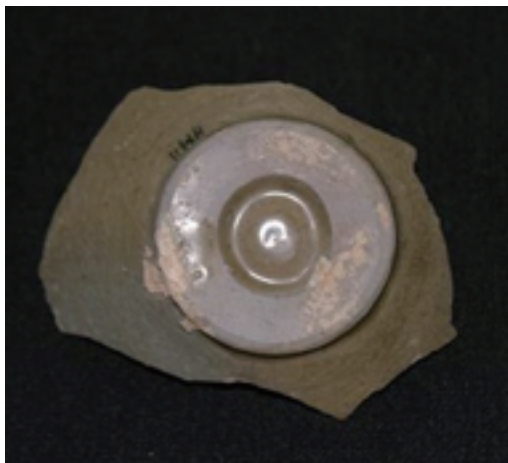
高麗前期（十至十一世紀末）的諸問題與對外關係

關於朝鮮半島青瓷起始年代的研究已逾百年，發表了超過兩百篇論文，但至今仍未有結論。^{〔註二〕}由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土地開發，許多高麗古墳常遭到盜掘、破壞，這是我們失去許多高麗青瓷之明確編年基準的最主要原因。一九三〇年代浙江省發現越窯後，便左右了此時期高麗青瓷的研究狀況。

如果將這些關於起始年代的學說加以區分，可大致二分為九世紀說與十世紀說兩類——即「新羅青瓷」說和「高麗青瓷」說。爭論的焦點在於一種著地處相當寬，被稱為「日暈底」的圈足（圖一）。九世紀說認為「日暈底」受到越窯「玉璧形足」的直接影響，從越窯的玉璧形足青瓷於九世紀中消失的情況看來，「日暈底」也在九世紀時出現於朝鮮半島。^{〔註三〕}相對於此，十世紀說的確切編年依據，只有出土於黃海道峰泉郡圓山里窯址的「淳化三年（九九二年）」銘祭器和現藏於南韓梨花女



十世紀韓國式玉璧形足碗 韓國中央博物館藏



圖一 青瓷碗破片 全羅南道康津郡龍雲里63號窯跡出土 康津青瓷資料博物館
譯按：
「日暈底」是韓國陶瓷史學者分類圈足形式的用語，專指一種著地處面積相當寬的圈足，如同太陽週圍的一圈光暈，或是玉璧的璧肉，也因此中國學者稱這類圈足為「玉璧形足」。

子大學的「淳化四年（九九三年）」銘青瓷壺，著重討論九世紀說的編年缺乏實際根據，和政治方面的背景。^{〔註四〕}

時至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則形成新的十世紀說和與之相對的九世紀說相抗衡的新局面。首先從十世紀說開始介紹。一九八二年相關單位調查京畿道龍仁市西里窯址，從最初期之青瓷窯的破片堆可知，圈足著地處寬度從約〇·八公分之狹窄的「先日暈底」（圖二左）朝向超過一公分寬的「日暈底」發展。^{〔註五〕}但是長久以來，「先日暈底」都未能被明確定義，直到九〇年代末期，中國浙江省發掘到越窯的寺龍口窯址，與越窯相關的新知才逐漸明朗，^{〔註六〕}而二〇〇一年南韓忠北大學校的李鍾致從和越窯的比較中，首次釐清「先日暈底」和登場於五代十世紀越窯、圈足徑約略相同的「玉璧形」足相似，且磚築窯、墊圈等窯業技術也直接受到五代越窯的影響。^{〔註七〕}相對於此，崔健再度論及九世



圖二 高麗青瓷「先日暈底」(右)與越窯玉璧形底(左)轉引自《高麗青磁の誕生—初期高麗青磁とその展開—》2004,頁15,照片9。
譯按:「先日暈底」為日暈底的前一階段,圈足著地處比日暈底略窄。

紀說,認為先日暈底「反較接近更晚的璧形足,並指出沒有出土墊圈的西里窯和土築窯的年代可能更早。」(註八)

在解決上述生產地的編年問題時,加入消費地遺跡資料會更有說服力,而高麗青瓷與中國、日本陶瓷的關係亦有再考量的必要。中國方面易流於只注重有玉璧形足的碗和越窯作品,但實有必要考察越窯之其他器型,以及越窯和其他窯

口的關連。就此而言,吉良文男的研究頗受矚目,他以初期高麗青瓷窯出土的花口盤類似五代黃堡鎮窯的花口盤為據,認為至少出土花口盤的地層年代可定在十世紀中。(註九)相對的,李鍾玟則留意到京畿道始興市芳山洞窯址破片堆的最下層中,花口盤和帶「甲戌」銘的蓋子破片共伴出土。「甲戌」可能是指九一四或九七四年,但李氏指出該破片所在的最下層只出土玉璧形底的「先日暈底」碗,上層變成「內底圓刻式先日暈底」(譯按:這也是一種玉璧形足,特徵為足底有一圈圓形刻痕,器壁角度更加銳利),而在消費地遺跡中,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的遺址有出土「內底圓刻式先日暈底」作品,故芳山洞窯址的上層年代必然落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期,再上溯最下層,當然年代早於十世紀末。所以「甲戌」可能是九一四年之外的年代,李氏認為其出現於十世紀前半,今後此議題的相關論述還會持續受到矚目。此外,由於和耀州窯的關

連而備受關注的是素燒問題。朝鮮半島中西部的窯無素燒器,但南部的窯則有素燒,李喜寬認為這是燒造後來被稱為「翡色青瓷」之作品的技術基礎,更指出其源流是五代耀州窯的可能性。(註十)素燒是高麗青瓷中最早出現的技術,下文談到高麗青瓷和汝窯之關係時,這也是相當值得留意的問題。

此外,高麗的白瓷和青瓷同時開始生產,現在的看法較傾向於與其說是外來影響,不如說是因應高麗內部需求而製作的觀點。但是影響高麗相當深遠、位於遼國境內的林東窯中,帶玉璧形足的白瓷碗直到十世紀前半都有燒造。且景德鎮窯除了燒製酷似五代越窯青瓷的青瓷碗之外,到了十二世紀也大量輸出白瓷到高麗,故其技術面的影響也引人注意。無論最終結論為何,我們有必要把視野放寬,不要侷限於越窯或玉璧形足,如此一來,隨著高麗青瓷編年研究的深入,對中國陶瓷研究應也會有相當大的啟發。

至於在日本，九世紀時則燒造近乎完全模仿越窯系青瓷之玉璧形足的灰釉和綠釉陶器。日本的生產狀況，也是過去高麗青瓷始於九世紀之說法的根據。但是目前並沒有包含其他器形，詳細檢討比較越窯、高麗青瓷、日本灰釉（綠釉）陶器的研究，將是今後的課題之一。此外，在越窯生產與輸入急遽衰落後，日本在十一世紀中期開始出土高麗青瓷的意義，也有必要從和越窯的關係，以及貿易史領域來檢討；換句話說，這在考量東北亞地區從「古代的陶瓷市場」轉變為「中世紀的陶瓷市場」的宏觀問題點時有重大意義。無論如何，這不只需要生產地的研究者，也需要其他許多地區的研究者的積極關心。

高麗中期（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青瓷的諸問題與對外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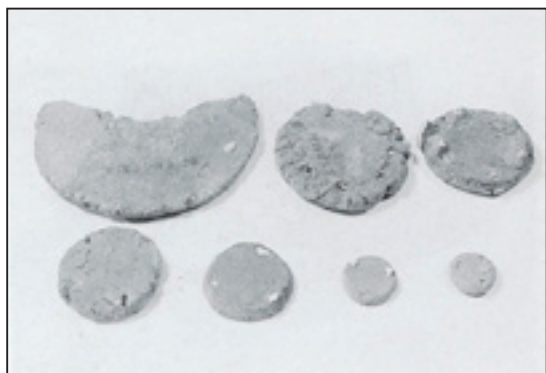
南韓梨花女子大學的張南原從高麗中期青瓷的消費地與

生產地遺跡調查成果，描繪出高麗中期青瓷的新氣象。〔註十二〕為解讀當時的對外關係，我們有必要研究朝鮮半島出土的中國陶瓷，近年來寺院等遺跡陸續出土中國陶瓷，其與日本、東南亞地區的輸入陶瓷的差異也逐漸明朗。〔註十三〕高麗出土的中國陶瓷中，不乏優秀的耀州窯製品，故很早就有人論及它對高麗青瓷有深厚影響。除了張南原提到高麗青瓷接受印花技法之外，〔註十三〕外國學者中，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蔣振西指出兩者在釉色、器形、印花技法和紋飾的共通性；〔註十四〕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的伊藤郁太郎指出高麗青瓷的高級品把耀州窯紋飾再加上細陰刻線，以更加提升表現力。〔註十五〕但最大的問題莫過於《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以下簡稱《高麗圖經》）記載高麗青瓷和汝窯的關係了。伊藤郁太郎和同美術館的小林仁花費心思收集此說法的記錄，更提出新的問題點，〔註十六〕他們整合兩者的問

題後得知，其多半集中於器形與技術方面。

在器形上，他們指出香爐、梅瓶、洗、雕塑類等特殊高級品，比一般容器更明顯反映出汝窯和高麗青瓷的共通點。不過就器形來說，也很難否定汝窯和其他青瓷窯之關連，或是經由金屬器、圖樣轉介的可能性，有必要再進行緻密的考察。此外，對《高麗圖經》裡出現的高麗獨有之器形「酒尊」，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伊藤氏認為此為水注，其他學者則認為是梅瓶。〔註十七〕但若參照《高麗圖經》的其他部份，用來倒國王喝的酒、被認為是梅瓶的器形，在該書裡記載為「瓦尊」，雖然確實照字面解釋的話，「酒尊」也可當作是梅瓶，而梅瓶又是高麗青瓷和汝窯共有的器形之一。因此上述資料可能暗示「酒尊」實際上較接近水注，但仍要等待今後的發現才可得到解謎的線索。

其次在技術方面，很早



圖四 帶有矽石的圓盤形支釘 全羅南道康津郡龍雲里10號窯跡出土 南韓國立中央博物館



圖三 帶有矽石的圓盤形支釘 全羅南道康津郡龍雲里9號窯跡出土 南韓國立中央博物館



圖五 青瓷器座破片 採集於杭州 轉引自馬爭鳴之論文

釉支釘燒」的燒成方法，也被十二世紀的高麗青瓷採用，不過汝窯用的是在環狀支圈上有突起的支釘，高麗則是在圓盤上放矽石以作為支釘。根據南韓朝鮮官窯博物館張起薰的研究，編年為十一世紀中葉以前的全羅南道康津郡龍雲里九號窯，已出土擺放矽石的圓盤狀支釘（圖三），此外正如前述的李喜寬所言，素燒技術和被稱為「翡色」的釉色也完成於

此階段。（註十八）不過在圓盤上放矽石的做法，從十二世紀前後的龍雲里九號窯階段開始，盛行於用在一部份高級品上，其種類增加，且汝窯的「芝麻支釘」這種細小支釘痕，也只見於同時期的高級品（圖四）。（註十九）若從發掘情況來說，這似乎是以高麗傳統技術為基礎模仿「芝麻支釘」，但現在則是證明高麗青瓷生產高級品時，以汝窯為範本的確切證據之一。無論如何，我們在談及汝窯與高麗青瓷的關係時，仍有許多部份尚待釐清，這正是此次故宮博物院展覽相當值得期待之處。

此外，盛行於高麗中期的鐵繪青瓷和象嵌青瓷，也有各種影響論。關於鐵繪青瓷，有廣州西村窯、磁州窯、定窯、耀州窯等各種路線之說，但尚無明確的解答。不過張南原將其生產地編年下修到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與中國陶瓷的關係將是今後的課題。（註二十）

象嵌青瓷方面，南韓Leum美術館金載悅指出，耀



十二世紀後半—十三世紀 早期高麗青瓷象嵌雲鶴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象嵌青瓷雲鶴紋梅瓶 鎌倉市千葉地遺跡出土 鎌倉市教育委員會

州窯前身黃堡鎮窯的黑釉刻花技法和高麗青瓷鐵地白堆技法的影響關係，^{〔註二二〕}北京大學秦大樹則指出磁州窯等華北瓷窯的影響。^{〔註二三〕}無論如何，象嵌技法無疑是高麗青瓷中發展最盛者，但為什麼會高度發展至此，則是相當有趣的問題。相關於此，以外圍——即「貿易陶瓷」的意念為基礎探討高麗青瓷的研究者卻相當少，使人倍感意外。

很早以前就有論文研究朝鮮半島以外出土的高麗青瓷，^{〔註二四〕}最近的發現中較引人注目的是南宋皇城遺跡發現的高麗青瓷（圖五）。這並非發掘品，而是馬爭鳴在南宋皇城遺跡中，伴隨陽紋刻花青瓷等高麗青瓷中品質極高的作品，和南宋官窯青瓷一起採集而得。^{〔註二五〕}此外根據同氏的說法，杭州市內亦出土品質較下等的象嵌青瓷。由於此非發掘資料，必須慎重考慮，但這彷彿使南宋時期太平老人在《袖中錦》書中所稱「高麗秘色，天下第一」的背景更明朗了。

另一方面，宋代的高度評價是否對高麗青瓷的生產有具體影響，至今則完全沒有被討論。更有甚者，它與南宋官窯青瓷的關係也使人在意，這在考慮汝窯與高麗青瓷的關係時，亦應被關切。

日本出土的高麗中期青瓷大致集中在鎌倉和京都（圖六），作為裝飾武家、寺院房間之物，其狀態與用途的研究相當興盛。^{〔註二六〕}此外，愛知縣瀨戶窯等日本中世陶器也被認為受到高麗青瓷的器形（以梅瓶為主）、紋飾的影響。^{〔註二七〕}上述日本出土品在日本國內確實是高級品，或許是作為權威的象徵。但與杭州出土的高麗青瓷相較之下，就南宋的杭州地區來說，日本出土品中，並沒有南宋皇城發現的種類，而和杭州市內發現者較為相似，或更下等。因此即使同為貿易品，比較日本和中國出土品的差別後，應可考察高麗國內貿易陶瓷的生產和交易的差異。

此外，印尼等東南亞地區，也有高麗青瓷出土品，故高麗青瓷流通範圍可能比我們現在所知更加廣泛，其流通管道也受到注意。如此看來，十二世紀中期以後，高麗青瓷的生產形態中，作為「貿易陶瓷」的脈絡將是需要檢討的課題，有必要從外側給予新的解釋，例如十二世紀以後，以象嵌為首的高麗青瓷之樣貌極度個性化，我們或有必要以此為背景、或從對外貿易的因素出發，從外圍尋找新的解釋。

高麗後期的諸問題與對外關係

關於高麗後期的問題，集中於一個焦點，即于支銘青瓷的編年問題：是十三世紀後半？或是十四世紀後半？有論者從文獻史料中將之視為給元朝的貢品，因此是十三世紀後半之作，〔註二七〕韓盛旭使用絕對編年資料的研究，則提示了十四世紀前半的可能性，尚待今後的檢討。〔註二八〕

至於此時期的對外關係，

則不可忽視和元代陶瓷的關連。雖然這向來僅止於簡略提及，但南韓龍仁大學博物館的金允貞詳細討論文獻和樣式上的關係。〔註二九〕以青花為中心的元代陶瓷影響，從伊斯蘭地區遠到日本，影響範圍極廣，藉由個別比較，應可刻畫高麗的特色，或反之，映照出青花自身的性格。

此外，海外的高麗後期青瓷出土例中，山東省蓬萊港的高麗沈船打撈出後期的高麗青瓷盤成為話題。〔註三十〕十四世紀後半的高麗青瓷紋飾多半被簡略化，胎釉呈褐色，元代《至正四明續志》（一三四二年）稱高級輸入品為「細色」；曹昭《格古要論》則提到古高麗窯，由此可知元末民初之際，作為古董的高麗青瓷是有一定價值的。或許我們也有必要研究高麗青瓷如何在包含新安沈船在內的亞洲地區建立其價值。

此外，高麗後期的特徵是「所」——迄今青瓷的中心生產

機構——的崩壞，內陸窯擴大規模，其過程有朴卿子的詳細研究。〔註三一〕隨著內陸窯的擴大，當然其產量亦增加，從日本的角度看來，生產量增加所代表的意義相當有意思。此時期以博多為首的北九州地區或日本內陸等地出土的高麗青瓷數量增加，森本朝子指出，其中一個原因在於明代的海禁政策，〔註三二〕而北九州地區整體出土高麗青瓷數量的增加，應也有必要考慮海盜的因素。這些最末期高麗青瓷的樣式，在被稱為「三島手」的肥前或訂製生產的茶陶上重現。晚期高麗青瓷和前述被視為古董的高麗青瓷的定位，對我們尋求日本建立對「高麗」陶瓷的印象之過程相當重要。〔註三三〕

無論如何，高麗青瓷研究，不僅需要生產地的研究者，更需要各個不同地區研究者的關心，期待本文能略盡棉薄之力，搭起兩側研究者的橋樑。



註釋

- 一、姜敬淑，〈고려시대 도자기의 대중교섭 (高麗時代陶器與中國的交流)〉，《高麗美術의 對外交涉》(首爾：藝耕，二〇〇四)，頁一九三—二四八。
- 二、片山まひ，〈「いつ」高麗青磁は誕生したのか？—高麗青磁の初現に関する研究史解題—〉，《高麗青磁の誕生—初期高麗青磁とその展開—》(大阪：財団法人大阪美術振興協会，二〇〇四)，頁一〇〇—一〇七。
- 三、九世紀說有許多相關論文，筆者認為較易取得的文獻為崔健者，古良文男譯，〈韓國初期青磁の分類と変遷〉，《東洋陶磁》二二一，(東京：東洋陶磁学会，一九九四)，頁四一—六四。
- 四、尹龍二，〈고려청자의 기원과 발전 (高麗青瓷的起源與發展)〉，《南韓陶磁史研究》(首爾：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一五一—一五二。
- 五、湖嶽美術館編，《龍仁西里高麗白磁窯》(龍仁：湖嶽美術館，一九八七)。
- 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二)。
- 七、李鍾玟，〈韓國初期青磁의 形成과 傳播 背景에 關한 研究〉(韓國初期青瓷의 形成과 傳播—以博梁窯和土器窯爲中心)，《美術史學研究》二四〇(首爾：韓國美術史學會，二〇〇三)，頁五一—五七。作者並未把「白磁底」的內底有圓形刻痕、器角度更加銳利等特徵直接連結到晚唐的玉璧形底，反而將之列爲高麗自己的新碗形，亦即「內底圓刻式白磁底碗」。
- 八、崔健，〈初期青磁 編年問題再論〉，《美術史學研究》二五〇、二五一(首爾：韓國美術史學會，二〇〇六)，頁二二—一四八。
- 九、古良文男，〈高麗青磁への一視點〉，《東洋陶磁史》，(東京：東洋陶磁史學會，二〇〇二)，頁四七—五四。
- 十、李喜寬，〈高麗翡色青磁의 出現과 土器子의 (高麗翡色青瓷的出現與素燒)〉，《韓·中·日國際學術大會對外交涉에서 본 高麗青磁—從對外交涉看高麗青瓷》(康津：康津青瓷資料博物館，二〇〇三)，頁十六—四一。
- 十一、張南原，〈高麗中期青瓷の研究 (高麗中期青瓷之研究)〉(首爾：梨花女子大學博士論文，二〇〇三)。
- 十二、國立大邱博物館，〈우리 문화 속의 中國陶磁器 (在我國的中國陶磁器)〉(大邱：國立大邱博物館，二〇〇四)。本書收錄各種朝鮮半島出土之中國陶磁的相關論述，集結了目前此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
- 十三、張南原，〈高麗中期 庄出陽刻 青瓷의 研究 (高麗中期印花青瓷的性恪)〉，《美術史學研究》二四二、二四三(首爾：韓國美術史學會，二〇〇四)，頁九五—一二〇。
- 十四、嵯振西，〈羅州窯의 高麗青瓷의 研究에 對하여 (試論羅州窯與高麗青瓷的關係)〉，《美術史論壇》七(首爾：韓國美術研究所，一九九八)，頁三一—四四。
- 十五、伊藤郁太郎，〈高麗陶磁史考〉，《國華》二二八三(東京：國華社，二〇〇二)，頁一九。
- 十六、伊藤郁太郎，同前註，頁一九—三十；小林仁，〈高麗翡色青磁と汝窯—近年の考古發掘と研究成果から—〉，《高麗青磁の誕生—初期高麗青磁とその展開—》(大阪：財団法人大阪美術振興協會，二〇〇四)，頁一八—一九。
- 十七、伊藤郁太郎，同前註，頁一九。
- 十八、張起薰著，片山まひ譯，〈窯道員からみた 韓國初期青磁窯跡の 相對編年〉，《高麗青磁の誕生—初期高麗青磁とその展開—》(大阪：財団法人大阪美術振興協會，二〇〇四)，頁八—九九。
- 十九、張南原，同前註。
- 二十、張南原，〈高麗時代 磁器의 成立과 展開 (高麗時代 鐵繪磁器의 成立與展開)〉，《美術史論壇》十八(首爾：韓國美術史研究所，二〇〇四)，頁四一—七二。
- 二十一、金載悅，〈高麗陶磁의 象嵌技法 發生에 對한 考察 (關於高麗陶磁的象嵌技法)〉，《湖嶽美術館研究論文集》二，(龍仁：湖嶽美術館，一九九七)，頁五—九。
- 二十二、秦大樹，〈宋·金代 青磁의 象嵌의 象嵌 技法에 對한 考察 (宋·金代北方地區 磁器의 象嵌工 藝與 高麗 象嵌 青瓷의 關係)〉，《美術史論壇》七(首爾：韓國美術研究所，一九九八)，頁四一—七六。
- 二十三、這方面有許多論文，參見金載悅的整理。金載悅，〈송·금·고려의 靑磁의 研究 (流布到中國的高麗青瓷)〉，《湖嶽美術館研究論文集》四(龍仁：湖嶽美術館，一九九八)，頁一五—三六。
- 二十四、馬爭鳴，〈靑翠觀麗活青瓷〉，《收藏家》六八(北京：收藏家雜誌社，二〇〇二)，頁十一—十四。
- 二十五、小野正敬，〈戰國大名と唐物莊藏〉，《陶磁器の文化史》(佐倉：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一九九八)，頁八。
- 二十六、谷井敦，〈日本の美術四一七八—元の青磁·白磁と古瀬戸〉(東京：至文堂，二〇〇〇)，頁四—四五。另一方面，梅瓶的器形受到漆器影響的說法再度浮現，期待今後再檢討的結果。
- 二十七、李喜寬，〈高麗後期 己巳銘象嵌青磁의 製作年代問題에 對한 新의 接近〉，《美術史學研究》二二七、二二八(首爾：韓國美術史學會，一九九八)，頁五—二八。
- 二十八、韓盛旭，〈高麗後期青磁의 器形變遷 (高麗後期青磁器形的變遷)〉，《美術史學研究》二三二(首爾：韓國美術史學會，二〇〇二)，頁五—一〇。
- 二十九、金允貞，〈高麗後期象嵌青磁에 對한 元代磁器의 影響〉，《美術史學研究》二四九(首爾：韓國美術史學會，二〇〇六)，頁三一—三五。
- 三十、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煙台市博物館、蓬萊市文物局，〈蓬萊古船〉(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二)。
- 三十一、朴麟宇，〈十四世紀 康津磁器所의 製成과 窯業體制의 變遷 (十四世紀康津磁器所的解體與窯業體制的變化)〉，《美術史學研究》二四三、二四四(首爾：韓國美術史學會，二〇〇三)，頁一〇—一四。
- 三十二、Mormoto Asako, "A New Approach to Enjimas from Medieval Hakata: Trade Ceramics as seen from Archeological Data",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Taipei, 1999.
- 三十三、Katayama Mabi, "Korean Inlaid Ceramics and Japan", *Establishing a Disciplin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Korean Art History*,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2001, pp. 137-150.